

黄

自选集

宏

Huang Hong



理论文库

学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宏自选集/黄宏著. (“学习”理论文库)

-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147 - 0346 - 7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社会科学 -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9959 号

黄宏自选集

HUANGHONG ZIXUANJI

黄 宏 著

责任编辑: 李 岩 张 俊

技术编辑: 贾 茹

出版发行: 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崇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B 座 11 层 (100062)

010 - 66063020 010 - 66061634 010 - 66061646

网 址: <http://www.xuexip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9

字 数: 3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47 - 0346 - 7

定 价: 85.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黄 宏

黄宏，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原所长，原全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少将，军职。三次参加自卫还击作战，曾为收复老山主攻团代政委、党委书记，立有三等战功。1990年以主要完成者获国防大学成立五年第一个政治理论教学成果一等奖。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负责人，参加中央30多篇重要文稿起草，曾随中央领导同志作国事访问、参加APEC会议，主持过10多个重大研究课题。所负责单位荣立集体二等功3次、三等功1次，被中组部授予全国先进党组织，2012年，中央军委授予集体一等功。2002年，四总部联合授予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共撰写和主编著作60本（套），发表理论文章、咨询报告500多篇，有20多份调查报告、建议引起中央、军委、总部重视，70多篇文章被全国报刊转载；18次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央机关课题，论文16次入选全国全军研讨会，连续三届6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先后负责过6部大型电视文献片的制作。改革开放30周年担任中央六部委合作的大型电视理论文献片《伟大的历程》总撰稿。《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华社等，以“理论战线的铁骨将军”、“竭忠尽智的红色理论家”、“黄宏将军的‘三个人生’”等为题材对其事迹作过多次报道。



我的理论档案

一些媒体来采访总爱说我有三个人生：军旅人生、理论人生、文化人生。是的，我16岁从军，三次参加保卫祖国边疆的作战，带领主攻团收复老山，立有战功。著有《作战归来的思索》（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作战心理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等书。2012年，我分别举办《千年梦华》、《茶和天下》反映中国古代瓷枕和茶具的两个个人收藏展，并将我在古代文物研究方面的理论文章以“至善唯美——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审美追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10月版）为题结集出版。然而，我最为看重的当然还是我的理论人生。

1984年收复老山后，我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介绍作战的政治工作经验，旋即留在学校，即后来的国防大学，成为了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

我对理论的喜好可以追溯到更早。20世纪60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虽然有不少“左”的色彩，

但却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论兴趣。记得我还在连队当一名小兵时，拿着6块钱的津贴，除了买几本贺敬之、郭小川的诗集，也买了胡绳的《枣下论丛》。90年代初，在苏州，我曾当面告诉胡绳院长，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本1964年买的《枣下论丛》。我放在包袱皮枕头里，在1964年的千里大拉练中，它伴随我泅过了金沙江、澜沧江。70年代初的批林整风，毛主席提出：“我党多年不读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我当时在军宣传处任教育干事，开始组织部队干部学习马列。1973年又曾到当时的军政大学读“六本书”。回去后我与宣传处王处长搭档，像演双簧似的，硬是现炒现卖，采取领读的方式，在军机关把《反杜林论》折腾了一遍。

我写的第一篇可以称为自己的理论文章，那是1975年写的《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与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文章寄给国务院研究室的《思想战线》，很快收到编辑部来信“拟刊用”。不期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使这篇文章的发表泡了汤。但国务院研究室的来函，成了我一个永远的纪念。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遍及全党，我也写了一篇《文艺复兴时期进步思想家对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发表于云南大学《思想战线》。也就在这一年，我报考了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生，专业、专业基础课均过了70分，唯外语不及格。1979年1月，我所在部队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回撤后部队临时驻训马关县，我再次

报考社科院马列所研究生，因担任了军宣传处长，读研再次泡汤。我不得不连续三年参加地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拿了一个大学专科文凭。

调入国防大学后，使我有可能会对部队工作的实践作系统的思考和总结。首先是我的几个研究报告，引起了总政的重视，《解放军报》邀请我以“作战归来的思索”为题，撰写一系列文章，前后达30多篇，联系部队作战的实践，探讨部队政治工作清除“左”的影响，深化改革的问题，并结集为《作战归来的思索》，1987年由李德生政委作序，薄一波题写书名，在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国防大学的教学中，我最为感到欣慰的是，在张震校长、李德生政委的支持下，我们把进修系的战时政治工作教学，搞成了一次开放式、研究式的教学，把历次参加边疆自卫还击作战的部队代表请到了学校，研讨成果形成了一本《边境局部战争政治工作探讨》，总政将此书发至全军建制团。这项教学科研成果，我作为主要完成者，获得了国防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个政治理论科研教学成果一等奖。

如果说，我对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还比较多的停留在经验形态，那么促使我真正走上理论之路的，则是1989年前后，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更深思考。我在中央报刊先后发表了10多篇文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忧患意识》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中国教育报》又加按语转载。在《解放军报》发表的《评美国的人权外交》、

《评〈河殤〉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等10多篇文章，均被报刊文摘转载。《评“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论”》是根据我在学校的一个讲稿压缩的，《求是》发表后，《光明日报》又以一个整版转载。我的研究视野从思想政治工作扩展到了更大的领域。

1990年元旦前一天，忽然接到学校校办通知，让我到玉泉山报到。中央确定要搞一个《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正好我与素来敬重的邵华泽、滕文生同志分在一组。任务完成后，我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帮助工作，这一待就是整整7年。7年间，我先后负责过中央苏东局势研究组办公室、中研室政治组等的工作，也曾负责过驻京大单位的苏东问题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协调组织，自己公开发表文章的机会少了，但内部研究报告却写了30多份，参与了30多份中央重要文稿的起草，研究的视角，也扩展到了国际问题、苏东教训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1995年，我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自选集《写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主要收入我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字。收入本文集的几篇论述国际问题的文章，也是写于那一时期。今天一看，也还有点价值，收两篇算是对那一时期的纪念。《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抓住机遇高速发展的启示》，则是我在1990年出版《太平洋的崛起》一书时写的笔记，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我作了些修改，在《求是》上发表。

在中研室工作的7年，我确定了作为一个党的理论工

作者的理想和信念。20世纪90年代初，楚图南为我写了一副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我努力将这个集龚自珍句的名联，作为我终身不渝的追求。1997年1月，我回到军队，担任了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当时我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我选择回到学校，正是源于我内心深处对理论的那份热爱。中宣部当时确定在全国设立五个理论研究基地，军队的基地就放在国防大学，具体的就在这个研究所，它除了自身的研究任务外，还要通过联络员制度协调全军的理论研究工作。

在这样一个研究所工作，如何在全国几大研究基地中显现自己的特点，我想不能不把个人的理论兴趣和研究方向，更多地与党和军队建设的需要统一起来，发挥军队的优势。回到军队，我接受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中心的各个联络单位，开展了理论攻关，编出了十分册的《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研究丛书》，在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江泽民等中央军委领导为这套丛书题写书名并题词。我自己也出了两本这方面的专著，写了几篇文章。

我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我自己的研究确定了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一是突出对党的理论创新，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在本文集中，我收入两篇关于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其中《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的基础》，是依据我1993年为中央起草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时，

所作的读书笔记改写的，当时我的三篇读书笔记发表于一个黑龙江党建杂志，我将其中一篇加以改写，参加第四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其意在于说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而是有相互联系的。

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上，我收入四篇文章，其中《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形成》，曾入选全国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研讨会，并在《求是》发表。

在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上，我收入了较多的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文章。这段时间，我带领马列所和研究中心的同志共发表了上百篇研究文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这篇发表于2000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是较早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大文章之一。这篇文章的撰写和发表颇有故事性。江泽民同志在广东高州的讲话中，论及“三个代表”，我当时意识到这里酝酿着党的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和突破，但怎么认识这个突破，我在苦苦思索。一天下班后，我坐在车里，忽然有了一个完整的思路，为了不至于把思路打乱，我便拨通了还在办公室加班的研究员郭凤海的电话，请他把我的思路记述下来，我便口述这篇稿子。第二天一早到办公室后，当即和郭凤海把这篇稿子整理出来，很快把文章发到人民日报理论部，不久这篇文章就以通栏标题加内容摘要发表了。这篇文章后被中宣部评为全国第八届

“五个一工程”奖。

同年5月，我在学习出版社出版了《“三个代表”与新时期党的建设》。并受总政委托，召开了全军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主持汇编了研究会的论文集，又组织全军的理论工作者，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丛书”十本。其中第一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是我和郭凤海撰写的，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这段时间，我在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史》被认为是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获得了“全国青年读物奖”。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硬道理——邓小平南方谈话回眸》获得了省级学术奖励。2003年中宣部召开的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我的论文入选了研讨会。我撰写的《“三个代表”：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人民性》、《从南方谈话到“七一”重要讲话》、《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性》、《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理论创新》等系列文章，均在中央主要报刊发表。2002年，由我担任总策划，与湖南省委宣传部合作，拍摄了电视理论文献片《世纪宣言——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这部片子被评为第八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我接触电视理论文献片这种形式，最初是1995年，我还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时，与天津

电视台合作的《中华魂》，与电视理论文献片《邓小平》一起获得了第六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这使我对电视理论文献片这样一种有重大影响力的宣传形式有了比较大的兴趣，促使后来我参与了一系列重大电视理论文献片的创作。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以很大的热情撰写了《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用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总结党执政的历史经验》、《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必然性》、《论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统一》、《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生态观》等一系列文章，均发表在中央主要报刊上。同时主编出版了《论党和国家关注的十四个重大问题》、《和谐社会论纲》等 11 本著作。

二是关注党和国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在我们党战胜历次风险中发挥战斗作用。

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军队理论工作者，在关键时候要能够站得出来，敢打硬仗。1998 年，我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我和所里的季明同志撰写了《抗洪抢险中的伟大精神力量》，《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收到 500 多封读者来信。1999 年，美国袭击我驻南使馆，引起了全国人民对这一暴行的愤慨和强烈谴责，我和季明连夜撰写了《凝聚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新华社又发了通稿，全国各报

予以转载，对把全国人民对美国暴行的谴责引导到振兴中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上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篇文章被评为全国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此外，在战胜党和国家面临的经济风险中，我和全林远撰写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战胜经济风险的理论与实践》，《经济日报》用一个半版的篇幅刊出。在我们党战胜法轮功的斗争中，我受人民日报委托，连夜撰写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新华社又一次发通稿，全国各报予以转载。此外，在战胜非典、战胜特大雪灾以及战胜台独等重大斗争当中，我都写出了有分量的文章，发挥了一个军队理论工作者应该发挥的作用。

面对思想理论战线的复杂形势，作为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但仅有这还是不够的。我历来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是复杂的，不是简单地作一个政治结论就能解决。写这类文章，更需要有实证材料的支撑、严密的逻辑和学术的含量，更要以理服人。仅以我收入文集的两篇文章为例，我就用了3年的时间来作准备，一篇是《论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价值》，一篇是《评一种流行的人口问题历史观》。前一篇文章针对的是有的人认为抗美援朝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它“迟滞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拖延了祖国的统一”，认为从战争的伤亡消耗上讲，我们也不能说打了胜仗。而另一篇文章所针对的，则是有的人称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所犯下的错误，“是20世纪中国

最悲惨的事”，“一个人的决策失误要一个民族用 100 年的时间来偿还”。“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成为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后果的概括。有人甚至写文章，称毛泽东最大的错误并非“文化大革命”，而是在人口问题上。在这两个重大历史问题上，仅仅从感觉上认为这个结论是不对的，那是远远不够的，你要写出有说服力、使人信服的文章，就必须充分占有资料，作出全面的分析，充分地研究国内外各种视角的研究观点，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我不是军史研究、更不是人口问题方面的专家，为写这两篇文章，我收集了上百本的专业书籍，进行了一番理论上的“脱毛”。这两篇文章在相关刊物和报纸上发表后，受到了这两个专业领域专家的好评。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一个重要乐趣就在于，它非常具有挑战性，促使你要不断地学习。

三是我们这个研究中心，首先是设在军队的研究基地，它理所当然的要把党在军事理论上的创新与发展作为研究的重要任务，在组织编写十卷本的“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丛书之后，我又撰写了《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理论》、《建设坚固的新长城》等著作，写了一系列研究邓小平新军事建设思想的文章，如《走出一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之路》。其后，又加强了对江泽民国防与军队建设思想的研究。2000 年在《解放军报》发表了《国防与军队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学习江泽民关于国防与军队建设的论述》，这是全国较早研究江

泽民国防与军队建设思想的文章。200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与洪宝秀合著的《世界新军事变革中的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江泽民同志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阐述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理论体系，是全国第一本较为全面的研究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学术著作，人民出版社两次再版加印。这段时间，我参加了中宣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的起草和专题片《航标》的创作。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我结合工作实践撰写《关于加强对治军特点和规律研究的若干问题》、《关于对我军政治工作指导性文件作出修改的若干建议》、《关于加强对高级干部监督制度的思考和建议》、《关于建立建全我军干部交流制度的思考和建议》、《关于十四集团军克服形式主义加强部队建设的调查报告》、《对西南战区几个全军先进基层单位发扬求真务实精神的调查和思考》、《关于上海城皇庙街道工委加强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调查报告》、《关于广东省加强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调查报告》等。

负责研究马列所和研究中心工作，我感觉一个理论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敢于面对现实，敢于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中研室工作的7年，培养了我在这方面的理论敏锐性和深入实践调查的工作作风，那段时间，我写了30多份内部研究和调查报告，参与和主持了《东欧剧变与执政党的建设》、《我国的社会治安及其对策》、

《党和国家关注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苏共的失败与教训》等重大问题的调研。在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我多次组织所里同志就党和军队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到地方调研。2002年，针对部队在非公经济中建立党组织的问题，我带领马列所的同志在温州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形成了《关于对温州非公有制经济党建工作系列调查》以及《科学历史地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剥削现象》两份大的调研报告。我深深感到，理论工作者一定要植根现实，简单的诠释和图解理论概念的宣传不是好的宣传。

党的理论工作者没有退休的时候。2006年，我退出了领导岗位，2008年又正式下了退休命令，成为了学校返聘教授，但我的理论研究工作并未划上句号，反而有了更广的视野和更大的理论勇气。2004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我有幸首批被聘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同时，我还是中央文献研究会、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等六个全国学术性组织的常务理事和中国社科报的编委、《中华儿女》杂志的副理事长。相比之下，配合形势与任务的理论文章写得少了一些，但是却承担了更多重大课题的研究，出版了更多的学术专著，撰写了更多的关系军队建设重大问题的研究报告。出于对军队建设的责任感，我又先后在国防大学科研简报上发表了《对加强我军民主建设的思考和建议》、《对改革我军奖励工作的思考和建议》，向军委呈送了《对加强我军军事科学和政治理论研究工作的思考和建议》、《关于加强对网

络信息工作的管理》等研究报告，总政原主任李继耐写信，对我予以了充分肯定。

我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科学社会主义课题组的主要成员，承担了三个分课题的写作，同时我还承担了郑科扬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课题，同样负责了三个分课题，围绕这些课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两个课题都形成了学术专著。《科学社会主义概论》是全国高校的通用教材。《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而我个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这一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的研究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一个热门课题，但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认识。如：如何看待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应不应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就存在不同的看法。此外，在借鉴当代社会主义诸多流派探索的新成果上，也有许多不同的认识。我在主持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时，没有回避这些争论，而是给出自己的回答。我在本书中，收入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算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综合思考。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前后，我围绕科学发展观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加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建设、民主建设，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等给予了更多关注。

深入总结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精神，努力建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宝库，是党在思想政治领域的重大任

务，也是理论工作的历史责任。2004年，我曾应人民出版社之约，编写了一套“弘扬革命精神”丛书，当时出版了4本，即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我深感我们党在各个时期创造的各种精神是我们党的精神宝库，需要倍加珍惜。于是，我把这套丛书做成一套开放的丛书，逐步加以扩展。包括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古田精神、红岩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兵团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浦东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等，迄今已出15本。围绕弘扬党的革命精神，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中国梦，我也发表了20多篇文章，做过几十场讲演和报告。我计划把这套丛书的编撰与唱响中国梦结合起来，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做。在此基础上，我还将编写中国共产党精神建设史。

退下来后，我还多次受领中宣部赋予的任务。十七大前，我和中宣部政策法规研究室的同志，共同到华东和东北地区调查，向中央呈送了建议党的十七大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主题的研究报告。2008年，我受中宣部委托，和陈晋同志共同担任中央六部委联合制作、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型理论文献片《伟大的历程》的总撰稿。其后，我又为上海策划并担任总撰稿，制作了《大江入海流——纪念浦东开发开放20周年》大型电视理论文献片。为云南制作《一代哲人艾思奇》，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时候，为上海策划了《誓言》电视理论文献片。